

湖南省古籍保护工作 简报

2011年第2期(总第5期)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办

2011年12月20日编印

● [信息综录]

-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张勇一行考察永州古籍保护工作 (2)
- 湖南图书馆派员参加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系统维护人员培训班 (3)
- 省古籍保护中心赴常德开办古籍普查及编目培训班 (3)
- 省古籍保护中心考察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 (4)
- 湘籍辛亥人物墨迹展在湖南图书馆开展 (5)
- 湘潭市图书馆主办古籍保护与地方文献工作培训班 (5)
- 衡阳市图书馆积极开展古籍普查保护工作 (6)
- 常德市图书馆古籍普查保护情况调查报告 (6)

● [麓山书话]

- 《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简评 (8)
- 民国间湖南图书馆版片收藏及毁损 (11)

● [湘人撷英]

- 湖南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道州何氏藏书 (13)

● [工作随笔]

- 《谭延闿手札》的修复 (15)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张勇一行考察永州古籍保护工作

2011年9月14至18日,在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湖南图书馆馆长张勇带领下,省古籍保护中心及省馆研究协调部、地方文献部等一行6人,对永州市县公共图书馆进行了为期5天的实地调研。此次调研主要任务之一是全面了解永州市公共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及保护工作状况,督导古籍普查及《中华古籍总目·湖南卷》的编纂。通过考察,了解各



馆的古籍收藏数量,分类编目情况,善本收藏状况,古籍书库面积,是否有专职库房管理人员,是否有防火、防盗、恒温恒湿、防虫、防霉、防鼠等设施,古籍阅览室面积、座位,古籍工作(编目、保护、修复)人员数量,是否制定有古籍库房管理及阅览规章制度,是否对外提供阅览或复制,是否已向省古籍保护中心呈交馆藏古籍目录,在古籍保护与利用方面有何成果及存在的问题等。

永州市辖2区9县11家公共图书馆藏有古籍者5家,藏有善本者2家。其中零陵区图书馆古籍26766册,善本1676册;祁阳县图书馆古籍17000册,善本247册;宁远县图书馆古籍1803册;东安县图书馆古籍2098册;江华县图书馆古籍3300册。零陵区图书馆精选出善本书专柜陈列,并编有善本书目录;祁阳县图书馆善书也已单独陈放,并完成馆藏古籍的编目工作。

调研中我们了解到,永州市县公共图书馆对于古籍及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已有充分认识,在现有条件基础上给予古籍最大程度的保护,部分馆完成馆藏古籍的编目工作,并积极完成《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湖南省珍贵古籍名录》的申报工作。但是,目前永州市县馆的古籍保护工作还存在古籍保护无专项经费、古籍收藏条件差、专业人员匮乏、古籍修复工作停滞、古籍开发利用为空白等现象,张勇馆长就这些问题和永州市县馆的领导及工作人员进行了认真探讨,并希望在省馆和市县馆的共同努力下,解决这些全省市县级图书馆普遍存在的问题,全面推动全省的古籍保护和普查工作。

(许志云)

湖南图书馆派员参加第一期 “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系统维护人员培训班

2011年9月20至22日,第一期“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系统维护人员培训班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培训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平台开发方博文楚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为期3天。各省古籍保护中心平台维护人员与业务人员60余人参加。湖南图书馆自动化部李佰承和文献研究所王晓庆二位同志参加了这次培训。本次培训的主题包括:平台的安装、更新及数据备份与恢复;服务及相关存储设备的日常维护;图书馆网络日常维护。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助理王红蕾在开班典礼上讲话,勉励学员珍惜这样难得的交流、学习机会,解决平台著录与网络维护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包菊香老师对普查平台做了简要介绍;国家图书馆信息网络部甘蒂、平台研发人员廖子南、IBM公司工程师袁鸣分别授课。

培训课上气氛轻松而热烈,学员纷纷提出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教员耐心讲解,化解难题。此次培训使我们掌握了全国古籍普查平台维护的相关知识,对推动湖南省古籍普查工作进程具有积极意义。(王晓庆)

省古籍保护中心赴常德 开办古籍普查与编目培训班



11月8日至9日,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联合常德市图书馆学会在常德市馆举办了一期古籍普查和编目培训班,湖南图书馆研究员、文献研究所主任寻霖,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刘雪平应邀主讲。来自常德市各地区、各系统古籍收藏单位的近40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开设了我国古籍保护工程概述、古籍基本知识、古籍版本鉴定、古籍库房管理、古籍分类和编目、著录实习等多项专业课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课程安排合理,内容翔实,既全面概括又侧重实际。寻霖老师的授课,深入浅出,生动透彻,并附展出相关实物,分析实例,使得课堂气氛相当活跃融洽。尤其是实习课堂,学员们踊跃提问,师生互动轻松愉快。

目前我省《中华古籍总目·湖南卷》的编撰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各收藏单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适时开办这样针对性强的培训班很有必要。此次培训,将对常德地区的古籍普查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刘雪萍)

省古籍保护中心考察 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



12月8日,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湖南图书馆副馆长雷树德考察了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该馆馆长杨军辉及古籍保护负责人张宇清接待并介绍了该馆古籍工作情况。

湖南中医药大学图书馆1960年正式建馆,2006年在含浦新校园又建成了一座新型的现代化图书馆。现有馆舍面积约2.5万平方米。馆藏文献资源总量达98万册,其中线装古籍2

万余册(包括部分影印古籍),百分之七十为中医文献。张宇清老师引领参观了古籍室。400平方米宽敞明亮的古籍收藏室,虽未装有恒温恒湿设备,但2万余册线装书存放在新制的古色古香樟木柜中,每套古籍均用定制的函套装好摆放,整洁、美观,函套内古籍保存完好。因该馆原古籍著录不完整,无单独的书本式目录,目前张老师正在对这批文献作进一步整理,按照国家古籍普查著录条例,进行完整著录编目。

考察过程中,雷馆长还介绍了目前国家古籍保护工作方针政策和湖南省古籍普查及《中华古籍总目·湖南卷》的部署及各馆工作进程,对加快该馆编目整理进度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保证下一步“湖南卷”联合目录汇编审定工作的如期开展。

湘籍辛亥人物墨迹展在湖南图书馆开展



为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湖南图书馆于 10 月 9 日至 15 日在四楼古籍阅览室举办“谁与斯人慷慨同——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湘籍辛亥人物墨迹展”,展出黄兴、宋教仁、杨度、谭延闿、章士钊、仇鳌、刘人熙等二十余位湘籍辛亥风云人物的字画手札。开展当天,湖南省文联副主席、湖南省书协主席何满

宗及其他 30 余位省内知名书画家在湖南图书馆副馆长雷树德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何满宗先生现场运笔,撰联“用书法弘扬美德,凭哲理倡导文明”。

湖南不仅是许多辛亥革命领袖人物的诞生地,也是辛亥革命重要的策源地之一,是最早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辛亥革命的主力军中,湖南人所占比重之大,名扬海内外。如有摇旗呐喊的“湖南之湖南人”杨毓麟,有振臂一呼、怒沉大海的陈天华,“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的革命元勋黄兴、“为宪法流血第一人”的宋教仁,戎马豪情的护国元勋蔡锷,以及被孙中山封为“开国元勋”的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等等。

百年沧桑,中国的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此展览让人们在翰墨丹青阅尽风流的流连忘返中,体验辛亥群英们的壮烈情怀,从而激发自己作为三湘儿女的昂扬激情,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努力。(刘雪萍)

湘潭市图书馆举办古籍保护与地方文献工作培训班

12 月 13 日,湘潭市图书馆举办“古籍保护与地方文献工作培训班”,特邀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湖南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雷树德作专题学术报告。市图书馆、部分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 20 余人参加培训班。

雷馆长首先介绍了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现状及我省古籍保护工作概况,重点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籍保护条例》(讨论稿)的政策依据和具体内容,还就地方文献中的核心文献、代表性文献、重要文献等进行了讲解。同时,向大家传授了地方文献收藏整理的相关专业知识。课后,雷馆长还与学员现场互动与交流,使学员进一步加深了对古籍保护与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湘潭市图书馆)

衡阳市图书馆

积极开展古籍普查保护工作

衡阳市图书馆成立于1921年,迄今已有80年的历史,是湖南省成立时间最长的市级公共图书馆,藏有古籍和民国图书近3万册,虽历经文革浩劫,但经过几代图书馆人的传承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献都得以妥善保存下来,其中《禹贡三江考》、《直音篇》等12种古籍被收入《中国古籍善本目录》,《二程全书》六十五卷被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1、古籍管理基本情况:现藏古籍、民国图书近30000册,其中善本书3000多册,独立书库,面积约300平方米,有专库管理人员和修复人员,有岗位规章制度。藏书入樟木书柜,善本入四方樟木小书盒,书库每年进行一次药物杀虫。为加强书库安全防护保卫措施,我馆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挤出经费对书库安装防盗窗、防盗门,书库的安全防范责任落实到人。

2、古籍保护宣传:为加强古籍保护,每年制定年度考核制度,并列入年底目标考核管理。为了让读者了解古籍,我馆在二楼大厅悬挂图文并茂的古籍宣传标牌,向读者介绍古籍基本知识,并在古籍、地方文献阅览室开辟一条陈列专柜,长期陈列地方古籍,让读者了解衡阳历史人物;多次在馆内举办地方古籍展览,如:蔡伦、王船山、曾国藩、彭玉麟等古代人物专著和人物简介。由于宣传到位,一位读者曾主动将自己收藏的清宣统刻本《增广贤文》无偿赠送我馆收藏。

3、古籍普查情况:从2008年开始,我馆根据省古籍保护中心的要求对馆藏古籍进行普查,为此专门开了两次专题会议,下发了有关普查工作布署的文件,使古籍普查工作做到有计划、有组织和有目标。期间我馆还两次派人到省馆学习取经,并派出三位从事古籍工作的人员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培训班学习。2011年4月份全面启动古籍普查工作,成立了普查小组,主管副馆长直接参与、领导普查工作,经过8个月的艰辛努力,目前已完成馆藏古籍重新审核,并按照省古籍保护中心要求填好《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简表》。下一步将开展县区公共图书馆的古籍普查工作。古籍保护任重道远,我们将继续努力。
(衡阳市图书馆 王芳慧)

常德市图书馆古籍普查保护情况调查报告

一、古籍普查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绩

1、收集、保存了大量珍贵古籍

据史书记载,常德古称武陵,位于湖南西北部,东濒洞庭,南临滇黔,西接巴蜀,北

连荆壤,乃西南交通之咽喉,东西商贸之枢纽。域内水网纵横,湖泊密布,是我国淡水养殖基地和重要的粮、棉、麻基地。既是鱼米之乡,也是洪涝之地,区域人民千百年来与洪水搏斗并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构筑了古籍地方史志的基础,常德市图书馆始建于1903年,是我国最早以“图书馆”命名的图书馆,一批志士仁人纷纷捐献了自己的大量藏书。新中国成立之初,图书馆、博物馆等领域就派专人开展了对重要古籍征集工作,保护了大量民间古籍。

2、对馆藏古籍进行了分编整理,普查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常德市图书馆就成立了参考咨询部,将古籍的管理纳于其中,湖南省文化主管部门及时派专家下到各馆,进行古籍分编整理的业务辅导,帮助鉴定了3种21册善本书,图书馆古籍收藏情况得到初步梳理。上世纪90年代末,常德市图书馆建立了古籍馆藏目录,并面向读者提供服务。进入新世纪后,按照湖南省文化厅的要求,全市编制了《全市公共图书馆古籍联合目录》,可在网上查询。近年来,为了按照新标准搞好古籍普查工作,常德市图书馆组织专业人员加班加点,对馆藏400多种古籍(1911年以前)进行了详细清点和分类编目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顺利完成,并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

3、努力改善馆藏条件,现存古籍得以妥善保存

常德图书馆在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钱单独开辟了一间古籍书库,添置了樟木箱、樟脑丸、灭火器、窗帘、空调、监控器等设备,基本上起到了防虫、防火、防光、防尘、防高温、防盗的作用。

二、市馆古籍普查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古籍收藏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

古籍保存条件至关重要,尤其常德居洞庭、长江之南,雨量充沛,温度高,湿度大,导致我馆古籍书库长期处于高温高湿的状态,加上我馆古籍全部放在封闭的柜子里,温度会更高,不便于通风、防蛀、除尘等专业护理。

2、古籍修复工作停滞

古籍修复工作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馆一无修复人员,二无基础设备,古籍修复工作基本是空白,但古籍经过长久的流传保存至今,由于长期受到人为及自然环境的侵害,存在烂头断尾、虫蛀水渍、酸化霉变、纸脆页破等不同程度的损坏。目前古籍修复工作是我馆的一大难题和挑战。

3、古籍开发利用工作有待加强

因专业人员缺乏和条件简陋,目前我馆虽然能够对读者提供查阅服务,但对于古籍的整理、点校、出版、影印等工作完全空白。

三、改善我馆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

1、改善古籍保存条件

收藏环境、保存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古籍的寿命,当务之急需要更换书柜,配备

温湿度检测仪及除湿机、空气净化器等设施,健全古籍书库建设技术标准和详细的古籍书库管理规则。

2、以普查为契机,推动全市古籍保护工作

目前,全市各馆要以普查为契机,联合地方相关部门,加强宣传,争取支持,将全市古籍保护工作真正提到议事日程。同时,通过古籍普查,在全市各馆建立起专业队伍,改变长期以来古籍工作不受重视,古籍鉴定、编目、保护人才缺乏等现象。

3、加快古籍数字化的再生性保护和利用

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都是一项长远的工程,对于破损严重的古籍,尤其是珍善本,可以采用缩微复制、影印出版、电子扫描、光盘存储等现代信息技术将古籍转化为数字化形式进入存储和利用,使读者在不翻阅原书的情况下进行阅览和使用,这样即可以抢救濒临毁灭的古籍,同时也可以解决古籍收藏与利用的矛盾。

(常德市图书馆 彭晓莉)

● [麓山书话]

《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简评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之时,湖南图书馆(即当时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仅有藏书14万册,其中古籍线装书约72000册,中文平装书约27000册,中文杂志(单本)约33000册。在随后短短数年内,湖南图书馆线装书猛增至90余万册,后经调拨、交换、赠送,仍有68万余册之多,民国间中文平装书也增至8万册左右。与数量庞大的古籍线装书相比,今湖南图书馆所藏民国间中文平装书在数量上并不为优胜,这也与民国乃至当代图书馆界“重古薄今”的藏书建设思想戚戚相关。

清光绪三十年(1904),民办官助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创始之初,即确立了“以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多者得资博览,创兴学校者得所考证为第一主义”,新思想、新学术之书得到了充分重视。一年后,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为官府接收,更名为“湖南图书馆”,全费官办,其宗旨也改为“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使藏书不及旅居未曾携带书籍者得资博览,学校教员学生得所考证为主义。”“保存国粹”,注重中国传统典籍的收藏也就成为了当时湖南图书馆的主要职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27年湖南图书馆与湖南省教育会图书馆合并组成新的“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后才得以改变,如傅熊湘任职期间(1928—1930),凡各公私单位及个人都可向中山图书馆推荐拟购书目;1931年中山图书馆临时办事处致函国内各大书局、图书馆,请求检赠书目,并登报声请各界人士介绍新书,以便随时添购,然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至解放前夕,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民国图书的数量一直无大的增长。

建国初期,湖南图书馆从民间,甚至造纸厂化浆池边,街头焚书堆中抢救出大量文献,使得馆藏民国文献数量激剧增加,且在质量上也具有自己明显的特征:

(一)湖南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极其丰富:2011年岳麓书社出版的湖南图书馆编纂《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提要》一书,即收入民国间湖南地方文献约3000种,其中绝大部分为湖南图书馆所藏,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类、文化教育类、经济类、历史地理类等,又其中绝大部分为当时湖南各级政府或地方人士编纂,省内自行印刷,不为诸家出版书目所收录,不被各大图书馆所入藏,故为湖南图书馆所特有。如《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提要》共收录民国期间教育类湖南地方文献321种,而《民国时期总书目》仅收录90种左右。

民国期间,湖南出版事业较为繁荣。据统计,长沙作为全省的印刷出版中心,出版事业集中府正街、南阳街、玉泉街一带,重要的书局有湘芬书局、宇宙书局、新中国书局、公益印书馆、湘鄂印刷公司、青年建国印刷厂、建国文化社、缤缤书店、求知书店、洞庭印务馆、博文印刷厂等。如湘芬书局开设20年(1930—1950),先后出版了近100种书籍;蓝田书报社创立于1939年,至1944年共出版书刊30余种,1946年复员迁回长沙,改名为宇宙书局继续出版;湘鄂印刷公司创立于清末,毁于1938年11月文夕大火,最盛时有工人300余人,是当时湖南规模最大,设备最齐的印刷厂。

1985年由北京图书馆编纂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共收录自1911年起至1949年9月出版的中文图书124000余种,其条目主要来源于收藏民国图书较多的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及重庆市图书馆,出版机构亦以三地居多。而湖南地方出版机构中,除长沙商务印书馆外,其他很少有收入《民国时期总书目》之中者。1991年《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出版》载: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1949年7月,湖南大约出版各种铅印、石印图书2300种,以及大量无法统计的宣传小册子、唱本等。这些出版物由于其区域性或印量少等原因,绝大部分未收入《民国时期总书目》中。

湖南地方文献及湖南出版物是湖南图书馆馆藏的优势所在,可以说要研究民国时期的湖南,是离不开湖南图书馆所藏的民国期间湖南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的。

(二)抗战文献品种繁多:抗战初期,华北、华东地区先遭蹂躏,上海、南京一些重要出版机构如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正中、文通、儿童、春明、群益等或西迁湖南,或在湖南设立办事处。上海沦陷后,由于华东地区书源告绝,湖南原有各出版机构纷纷加大编纂、印刷业务,并成立了一些新的书局。据统计,抗战期间湖南编辑出版的图书达700余种,内容大多宣传抗日救国。主要分布在长沙、衡阳、耒阳、邵阳、蓝田、沅陵、常德等地。形成了湖南出版史上一个短暂的高峰时期。如蓝田,本是安化县一个

偏僻集镇,随着国立师范学院及长沙一些中学的迁入,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即书局就有新中国书局、蓝田书报合作社、袖珍书局、分丰馆、学余编印社等数家,出版图书百余种。如今的蓝田已成为湖南涟源市首府所在。随着战局的发展,特别是受文夕大火的影响,这些出版印刷机构或停业,或更深入湖南中、西、南部更偏僻地区继续出版,有的则再次西迁川、黔。

(三)革命文献数量庞大:民国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变革时期,其间产生了大量革命文献,如馆藏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以及各期间毛泽东著作版本等,都弥足珍贵,是研究党史的珍贵资料。而湖南本地所出版的革命文献更是丰富多彩。早在1919年,毛泽东便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1920年8月,毛泽东、彭璜、易礼容、朱剑凡等发起组织长沙文化书社,公开发行销售马列主义书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湖南是共产党活动较为频繁活跃的区域,中共湘区委员会不仅通过文化书社、长沙真理图书社大量发行革命书刊,还自行编辑出版。如1921年至1924年,共产党员李六如编写《平民读本》凡四册;1922年郭亮在长沙创办《工人之路》,1923年湖南自修大学出版李达主编的《新时代》等。大革命时期,湖南作为一中心区域,革命文献的出版更为繁荣,如1924年李维汉等人主办了《新民周报》;1925年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创办了《战士》周刊等。特别是北伐前后,其时湖南省政府由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人主持,革命文献的出版进入一高潮时期。据今大略统计,目前湖南图书馆藏各个时期出版的革命图书、期刊、报纸500种左右,其中一些为湖南图书所仅有,如《湘江评论》,毛泽东曾为此刊撰写《创刊宣言》、《民众的大联合》等三十九篇文章,反映了这段时期毛泽东思想由改良向革命的彻底转变。本刊共出五期,湖南图书馆存四期,原为徐特立所藏,1983年随徐老全部藏书捐赠本馆,上有徐老圈点及批注,更显珍贵。1930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占领的唯一省会城市。入城第三天,红三军团政治部就利用原《大公报》设备出版了一份正式、规范的《红军日报》。由于红军占领长沙仅九天,《红军日报》也只出版六期。今湖南图书馆存8月4日一期共六版。

长期以来,各图书馆都有重视珍善本、重视线装书,而轻视民国书刊的现象,如对善本库房进行恒温恒湿改造,编纂古籍线装书目录等,但对于民国书刊,因其年代相隔不久,而认为价值不大,多存放于普通书房中,许多图书馆尚未完成分类编目,普遍存在家底不清的现象。其实,由于民国书刊多使用机造纸,其韧性及保存年限反不如清代及以前的手工纸;民国书刊采用平装或硬面精装,两面印刷,一旦破损,其修补困难远较线装书较大。至今世界各国尚未有一种简便、廉价的旧平装书修补方式,使得这些珍贵的文献正面临着加速损毁的严峻现实。若不再加以切实保护,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也许有能看到甲骨文、敦煌遗书,却反而看不到民国时期的书刊的危险。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民国时期文献正是以文字记录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保护好这些珍贵的民国时期文献,特别是革命文献,是对历史的继承,对民族的负责,是我们的神圣使命。”(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同志语)

相对于古籍线装书而言，现存民国文献数量远远超过存世的古籍数量，1985年《民国时期总书目》共收录当时北图、上图及重庆市图书馆民国中文图书124000余种，然而其他图书馆都收藏有大量的地方文献和地方出版物未收入此目录中。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众多学者秉承传统文化，吸纳西洋现代文明精神，创造了大量的新学科、新著述。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第三个诸子百家时代”。新学科、新文献层出不穷，使得民国文献内容极其丰富，远远超出中国传统古籍经、史、子、集所能涵盖的范围。民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时期，其间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阶段，民国书刊是这一历史变革的见证，是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的文化产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传统的线装书相比，民国图书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一改数百年来线装固定样式，开始设计封面，书中附插图，这些精美的插图及设计极具艺术代表。其中著名人士著述的早期版本和重要版本、签名本、毛边本、精印编号本、因作品被禁而出现的伪装本、删节本等均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

国家极其注重古旧文献的保护工作，近年来陆续实施了“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古籍保护工程”等重大文化项目，在国内外反响极好，影响极大，效果显著。随着以上工程的不断推进与完善，民国文献的保护工作也将蓬勃开展。而编纂一部完整、完善的馆藏民国书刊目录是做好民国文献保护及开发工作的前提与基础。

基于此种观念，在完成《馆藏古籍线装书目录》编纂出版后，湖南图书馆随即开展了对馆藏民国文献的编目整理工作，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湖南图书馆民国图书期刊报纸目录》编辑出版工作。该目录是《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目录丛编》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已于2006年出版。

民国间湖南省图书馆版片收藏及毁损

辛亥革命后，旧有官书局都停止业务，湖南另成立图书编译局。1914年图书编译局又归并到新成立的官书报局。原长沙府学、湖南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及部分公私所刻板片也一并移交官书报局管理。

汤芑铭督湘期间(1913年10月至1916年6月)，湖南官书报局纯系安置私人之机关，每月坐领干薪者不胜枚举。汤离湘后，1916年7月萧度任官书报局局长，大加整顿，分设文版、庶务、编印、营业四课，并拟修湖南通志。12月官书报局又奉令撤消，因原定王台湖南图书馆原有排印、刊印二所，故将官书报局设备及版片归并湖南图书馆，另成立湖南图书馆图书出版部。(清末湖南图书馆创建之初，便设有“纂修”一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巡抚庞鸿书奏设图书馆，即以调查编辑为首任。宣统二年(1910)，根据学部颁定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湖南图书馆删编辑而设排印、刊印二部，但并未开展业务)。1918年，当时湖南督军张敬尧意欲垄断湖南印刷业务，指示湖南图书馆馆长周镇澄将图书出版部之机器、铅字、纸张等折价一万元，

与私商杨浚湘合办“湖南图书纸张印刷局”，由周充监理，原湖南图书馆所存版片不作股本，仍归图书馆保存，但印刷局得随时借用印刷。后因股金不齐、股款不实而破产。1920年11月，省长谭延闿积极推行社会教育，认为“出版事业极有关于社会文化。近人译著，又多无处印售。而各中小学校采用教本，或因地域之关系，或因时代之思想各殊，取材取义，每多扞格。至于有关社会职业补习各种教育书籍，需用尤急，无从购买”，故仍将原附设于湖南图书馆之图书印刷出版部分划出，另行组建“湖南图书编译印刷处”，李剑农、任凯南、唐璆先后任印刷处处长。然自创始之后，并未编译过一本书籍，“担个虚名罢了”，而湖南图书馆读者服务业务却因此停顿。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湖南即以“湖南图书编译印刷处”名义参加。1925年7月，省长赵恒惕撤消图书编译印刷处，恢复湖南图书馆，以原处长唐璆任图书馆馆长。

1927年，湖南图书馆与省教育会图书馆合并组成新的“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定王台之书运往省教育会馆舍，定王台馆舍仍作贮存版片之用。1930年省教育会馆舍及藏书在战乱中付之一炬，荡然无存，而定王台馆舍及版片皆幸免于难。之后，定王台馆舍即被湘军驻扎，军士任意搬动，甚至劈板作薪，版片损失较大。1931年省立中山图书馆筹备恢复后，多次申请省政府将驻军迁出，直至1933年夏，驻军才最终完全撤出。中山图书馆领取临时经费860元对定王台馆舍稍事修葺并对版片进行清理翻晒，对已生虫版片采用辣椒、花椒、明矾、樟脑等药品进行煮洗。据1935年《湖南年鉴》载：“定王台既为图书馆旧址，所藏古籍版片，甚为夥颐。自军队入驻后，管理深为困难，因之散失不少。中山图书馆于民国二十年奉令恢复之际，同时奉教育厅令，接收定王台版片，并核发整理版片费八百六十余元，至驻军队迁移后，即派员清查各种版片，霉烂者加以煮洗，残缺者照式补刊。现已整理者，计有《曾文正公全集》、《五种纪事本末》、《梓湖文钞》、《八代诗选》、《古文辞类纂》、《孙渊如集》、《方言》、《唐韵正》等十余种。并拟将《曾文正公全集》等书板重新印刷，以广流传。”

1934年4月15日湖南省中山图书馆向省教育厅汇报《定王台书板残缺及应补刊大概情形》一文记述：（一）全部未缺者有《庄子集释》、《韩非子集释》、《荀子集释》、《晏子春秋》、《盐铁论》、《潜夫论》、《水经注》、《释名疏正》。（二）此次补刊完全者有《曾文正公全集》、《五种纪事本末》、《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古诗源》、《孙渊如集》、《唐韵正》、《骈文类纂》、《梓湖文钞》、《八代诗选》。（三）正在补刊者有《方言》、《浮丘子》。（四）尚未补刊者有光绪《湖南通志》，计残缺及虫伤者欠二千二百余块，每块约六百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计需洋四千元。《湖南文征》，计残缺及虫伤约四千块，每块约六百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需洋七千元。《十三经注疏》，计残缺及虫伤约欠三千块，每块约一千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计需洋九千元。《玉函山房丛书》，计残缺及虫伤约欠一千块，每块约四百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约需洋一千元。《通鉴辑览》，计残缺及虫伤约五百块，每块六百字，以三十元一万字计算，约需洋一千元。以上未补刊各书约需费补刊工资洋二万二千元。

湖南图书馆除保存原有版片，也接受或购买私家版片。如1932年，王先谦夫人宋氏将葵园著述《后汉书集解》、《诗三家集义疏》、《尚书孔传参正》、《前汉书补注》、《虚受堂诗》、《诗义标准》等其他共十六种书籍版片捐藏湖南中山图书馆。（但书版似乎并未

移交,仍存于王先谦东乡凉塘老屋,抗战期间毁损严重。解放后,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收拾残余,仍得三千六百余片藏于湖南图书馆。)1935年,省主席何键购赠程颂万《十发居士全集》版片一部;邵阳谢维岳捐赠自著《龙山丛书》版片一部,内有《易经释义》十册,《周易数理分解》四册,《诗经汇编》八册,《四书类编》四册,《中道全书》十六册,《尚书合辑》八册等,价值2000元。1936年中山图书馆自年度临时费用内拨款1600元购买长沙徐氏版片三种,即《五大家文粹》(443板)、《景宋本脉经》(220板)、《璧合珠联集》(477板)。

1935年4月湖南省政府拨款8000元,由省立中山图书馆刷印《曾文正公全集》二百部,分赠中央各部院、全国各大图书馆及全省各县收藏。湖南中山图书馆还就原存版片刷印《庄子集解》、《韩非子集解》、《荀子集解》、《晏子春秋》等,皆销路甚广。

1938年10月,日机狂炸长沙,因迁徙不及,定王台馆舍竟于10月19日被炸,房屋及所存数万块版片皆遭焚毁无遗。

目前湖南图书馆尚存各类版片4000余块,大部分为葵园旧物。其中完整无缺者仅光绪《南岳志》一种,有正反两面镌字板片627块。原藏南岳图书馆,1956年南岳图书馆撤销时移交湖南图书馆。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曾借用重新刷印百部。

● [湘人撷英]

湖南近代四大藏书家之一

——道州何氏藏书

道州何氏五代藏书,经何凌汉、何绍基、何庆涵、何维朴、何维棣,至何诒恺,延绵百年,所藏达十馀万卷。且大多经朱筠朱锡庚父子、徐松、翁方纲、王筠、张穆等人递藏或手校,学术价值极高。

何凌汉(1772-1840),字云门,号仙槎。官至吏部、工部、户部尚书。曾收藏有北京朱筠的旧藏不少,建有藏书楼“云腴山房”,收藏图籍万余卷,何氏藏书由此起源。著有《云腴山房诗文集》。其藏书读书处为云腴山房、瑞菴书屋。藏印有“何陵汉印”、“道州何氏云腴山房”朱方。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猿叟(一作蝮叟),何凌汉之子。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历充广东乡试考官、提督,擢四川学政,后被罢官。晚年主山东泺源、长沙城南、苏州、扬州诸书院,博涉群书,于六经子史,皆有论述。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板文字。书法自成一家,上溯秦两汉古篆隶,下至六朝南北碑,皆心摹手追,草书尤为一代之冠。著有《惜道味斋经说》、《东洲草堂诗文钞》、《说文段注驳正》等。

何绍基藏书始于父何凌汉。凌汉藏书万卷,如一次就以185千文购朱锡庚(朱筠

之子)抄稿本十种,故其书颇精。至绍基时,南北藏书旧家,广为搜罗,一度藏书达到 10 万余卷。傅增湘云:“就余所寓目者,东洲草堂所藏有《汉隶字源》、许氏《说文》,皆宋刊孤本。而媛叟录《乾隆政要》及说经之书,至数十巨册,”“何子贞藏书多自题书签,手写字根,其书装厚册,一望而知”。所藏以宋元本、明清抄本、稿本及清代禁书为特色。宋元本有《诗经音释》、《李太白集》、《韩文考异》、《文选》、《普济方》、《韵补》、《古史》等;明本有《楚纪》、《颜鲁公集》、《濂溪志》、《昌黎先生集》、《通典》、《金石古文》、《樊川文集》及汲古阁刻《说文解字》、汲古阁影宋抄本《重续千字文》等;稿本有顾元熙《说文部次便览》等。历代书帖“上溯周秦两汉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帖,搜辑至千余种”。又尤喜抄书。其藏书处曰东洲草堂、云龙万宝书楼、眠琴阁、浣花楼、惜道味斋、剑光阁。藏印有:“道州何氏收藏图书印”白方、“何印绍基”朱白方各一、“子贞”朱白小对方各一、“云龙万宝书楼”朱方、“云龙万宝之轩”朱长方、“道州何氏藏书”朱长方、“何绍基印”朱大方、“媛叟眼福”朱方、“媛擘翁”朱方、“道州何氏珍藏”朱方、“道州何绍基印”白方、“东洲草堂”朱方、“道州何氏收藏”白方、“剑光阁印”、“道州何氏”、“道州何氏云龙万宝书楼”、“何绍基子贞印”、“不洗砚斋”、“读异书饮美酒赏名花对丽人”等。

何庆涵(1821-1892),字伯源,何绍基之子。咸丰八年(1858)举人,援例改郎中,分刑部。著有《眠琴阁遗文》。承其父东洲草堂藏书。藏书处为眠琴阁、东洲草堂。

何维朴(1844-1925),字诗孙,一作诗荪,号盘止,别号盘叟、秋华居士、晚遂老人等,何庆涵子。同治六年(1867)中顺天乡试副贡,官内阁中书,改江南候补道,江苏候补知府,任上海滩浦补局总办。受祖父、父辈藏书影响,性喜收藏书籍,以刻书、卖书为业,收藏甚富,并精于鉴别,其藏书处有“颐素斋”,又精于书画流略之学,书风仿何绍基。其弟何维棣(1856-1913),字棠荪,官至四川道员。兄弟二人严守祖辈遗书,又多方搜罗,使“东洲草堂”藏书,巨编大册行列,古今名人书画富于一时。辛亥后寓上海盘梓山房,以书画自给。画以山水著称。其藏书画印文有“清凉山下转轮僧”、“颐素斋珍藏”、“东洲草堂藏书画之印”、“盘梓山房”、“何维朴印”、“诗孙”等。收藏古印甚多,辑有《颐素轩印存》、《颐素斋印景》。

何诒恺,字号及生卒年、仕履不详,何维棣之子。有“道州何氏诒恺”印。

东洲草堂藏书自何凌汉起至诒恺已传五世,然败散于诒恺之手。何诒恺染阿芙蓉之癖,以五世藏书卖钱买鸦片,以解其瘾。与之同时之长沙叶启勋、叶启发兄弟以廉值购其所藏。故拾经楼、华鄂堂之善本书大多取自于何氏。散出之书,叶氏所得外,亦有转至沪宁京杭者。今湖南图书馆尚收藏甚多。

何氏藏书有《东洲草堂藏书目》稿本二册,今藏湖南图书馆,有叶启发题记两条:“此道州何氏东洲草堂藏书书目……余得东洲旧藏颇多,在此目之外者十之八九,知此尚非其家藏全书目也。”按此目系何绍基手书稿本,字迹流畅雅丽,赏心悦目,无愧一代名家。然此目著录甚简略,仅记书名及本数,间记套数,即一书之副本也,无著者及版刻状况。依箱著录共 90 箱,约 2000 种。据叶启勋题记云,其所收何氏之书十之八九不在目内,则何氏藏书总数当近万种。

● [工作随笔]

《谭延闿手札》的修复



1、《谭延闿手札》的品相与内容

《谭延闿手札》(以下简称《手札》)为一册,订线方式。书长 27 厘米,宽 25.6 厘米,书背厚 3 厘米,书芯厚 4.5 厘米,书衣为黄褐色。书写纸张为专门印制的十行公文纸,分别有“都督室用笺”、“都督府秘书室用笺”、“都督府秘书室启事”、“湖南督军署用笺”、“湖南督军公署”、“军事厅通用笺”等,也有普通十行纸,还有数张红色十行纸。卷首至卷中保存完好,卷尾部分约 2 厘米厚度的下脚破损严重,托纸两面随意粘贴的信件大大增加了书芯的厚度,故书芯高出书背 1.5 厘米。

2、《手札》整理和修复摘要

2.1 修复《手札》之前慎重制定修复方案

对于修复这部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手札》,笔者征求有关专家意见,制定了《手札》修复方案,主要从纸张的整治着手,修残补缺、杜绝酸化和虫蛀对手札的危害,具体为:(1)坚持“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保持原手札的装订方式与风格品貌。在修复《手札》的同时,对其纸张进行脱酸和防虫处理。(2)补纸采用与手札相同的 0.1 厘米厚的白色绵连纸和 0.2 厘米厚的浅黄色连史纸。(3)厚达 4.5 厘米的书芯,影响读者的翻阅,故将保存较好的卷首部分与破损严重的卷尾部分一分为二,分成两册。(4)把低于书芯的书背裁纸垫高,以与书芯平齐。

2.2 修复整理信札的基本原则——保持原貌

《手札》原书品设计太小,原装帧将没有文字的上下左右余纸部分剪掉,严重破坏了手札的原貌,只有少数几张因为文字书写在整张纸上,不能剪去,才将原纸贴在托纸上,而将多出的部分折叠起来,才侥幸得以保存原貌。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装裱还是修复整理重要信札,保持信札原貌必须成为基本原则之一。若需将大量信札装订成册,必须事先确定能包容手札足够大的书品,以便能够将信札整幅粘贴在托纸上。

《手札》信件的纸质有两种,分别为浅黄色连史纸和白色绵连纸,托纸为黄色浏阳二贡。为了整旧如旧,笔者在旧纸架里找到了与其破损程度、颜色相当的旧纸做补纸。虽然说把“新纸加工染成同样古色的纸张,这样既与所修古籍的纸色相协调,又比旧纸牢固,修成的古书既美观,又实用”,但染色新纸的强度比要修复的古书的纸的强度坚实得多,如果用上这样的补纸,对古籍也是一种损害。

修复时,信件上用墨书写的字虽然不跑墨,但朱红色的栏线遇水很容易洇染,所

以在修复、喷水压平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实在避免不了的,可以把浆水涂在补纸上,然后再补上去。这样会好很多。

2.3 手札的修复和装订坚持“过程可逆”的原则

由于手札原件在粘贴时浆糊点得太多,有的变成了浆糊硬痂,甚至还有用化学胶水粘上去的,稍不小心,就会撕破信件,这违背了古籍修复“过程可逆”的原则。为了不使手札损坏,笔者揭托纸时,先将破损严重的卷尾部分 191 张信件按原顺序用铅笔轻轻标上序号,用小竹签一一撤下,然后,用 40℃左右的温水点在托纸点浆糊的地方,放置一边,约三分钟后,浆糊被浸透软化,失去粘性,再揭,不急于求成。如果仍揭不下来,就刷上温水,稍后再揭。这样,既不会撕破信件,信纸上也不会粘上一层托纸。再用小刀片小心清除浆糊硬痂。

对于原来稠浆糊甚至化学胶水随意粘贴的信件改用稀浆糊粘贴,一张信纸上只点四到六点浆糊,将它按一定顺序粘贴。这避免了浆糊用得太多而结痂,且易引起虫蛀。

2.4 在整旧如旧的前提下提高手札的品貌

由于原书书芯高于书背 1.5 厘米,修复时书背须垫高。垫书背时,对卷首没修复的那一部分,将其与托纸相类似的配纸,裁成与书背同长宽(27×2.8 厘米)的长方形纸条,隔几页,两 endpoint 稀浆糊粘好,直至平整为止。对修复过的卷尾,在裁托纸时,就多留出书背的尺寸的两倍(27×5.6 厘米),在齐书页时,回折,直至平整为止。

《手札》修复后为 2 册,每册 2 厘米左右,书背和书芯平整如一,既美观,又便于保管和读者翻阅。经过脱酸处理,每张信件的 PH 值均大于 7.0,呈弱碱性,大大提高了“手札”纸张的柔韧性和强度,延长了“手札”的寿命。(施文岚)

湖南省古籍保护中心

地 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169 号

电 话:0731-84174012

网 址:www.library.hn.cn

邮 编:410011

传 真:0731-84174012

邮 箱:zhaoxg@library.hn.cn